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王巍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总书记对几代考古工作者的肯定,令参加探源工程的20多个学科的400多名学者非常激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展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在距今5000多年前,中国各区域农业、人口增加,规模宏大的都邑相继出现,社会复杂化加剧,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率先跨入文明阶段。距今4500年前,通过与域外其他文明交流互动,先民们从西亚地区接受了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文化因素,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距今3800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规模巨大的都邑,形成择中建都的都城选址理念和由青铜器、玉礼器等构成的礼乐制度。这些礼器及其蕴含的观念向四方辐射。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至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向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

这一年来,考古界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努力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更多的学术课题设置和主动性考古有序开展。湖北十堰学堂梁子、甘肃庆阳南佐、安徽含山凌家滩、辽宁喀左牛河梁、山西兴县碧村、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许多考古新发现,或填补了重要节点的空白,或丰富了重要区域的细节,或弥补了重要链条的缺失,为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在进一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在这方面,各地文博机构都做了很大的努力,文明探源的很多考古成果第一时间在博物馆得到展示。博物馆的展出也更加亲民、更加通俗,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应用日益普遍。一些更适合传播的短视频、纪录片、综艺节目拉近了民众与文明探源成果的距离。去年,新一批40多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批立项或挂牌,使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有助于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作为一个从事考古工作40多年、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年的老兵,我觉得有义务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努力,促进社会各界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化文明研究和促进成果转化传播方面形成更多共识,达成更多目标。一年来,我先后在国家部委、大学和科研机构、大型国企等单位做了数十场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果的报告。作为学术顾问,我深度参与指导策划了《中国考古大会》等大型节目,以及正在拍摄中的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历程的系列纪录片。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加强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

旬邑西头遗址寻“鹵”记

豆海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鹵风·七月》是《诗经·国风》里最长的一首诗,如一幅风俗画卷,详尽描述了西周先民们在鹵地一年四季辛勤劳作的场景。据文献记载,夏朝末年,周人先祖公刘率领部落迁居到“鹵”地,公刘的儿子庆节在鹵地建国。自此以后,这个部落就在鹵地建立城邑,发展农业。到了古公亶父时,才率领族人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并且以地为名,称为“周人”。

鹵地究竟在哪儿?2018年至2022年,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型城址和高等级墓葬,为寻找鹵地打开了新局面,并入选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西头遗址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距泾河约4000米。5年的考古发掘,循序渐进,先后在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5个地点发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发现贯穿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的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目前确定



河南安阳殷墟王陵区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尊。



山西兴县碧村村址东门俯拍。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出土的带盖彩陶平底瓶。



王晓毅 张光辉

从碧村遗址看四千年前黄河岸边的文明图景

山西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关注区域。经汾水贯穿山西全境的“Y”字形文化传播带,在距今4000年前后,连接起了当时非常耀眼的两大文明中心——石峁和陶寺。而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既是石峁文化圈的重要一员,又与陶寺并立于黄河东岸,成为阐释当时晋陕黄河两岸文明形态、揭示黄土高原广大范围内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重要窗口。

碧村遗址位于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遗址周边环河邻沟,西抵黄河,东部以一道横亘南北的石墙为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城,面积达75万平方米,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

作为晋陕大峡谷东岸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史前石城,碧村遗址拥有双重城垣和严密的城防系统,彰显了浓厚的防御色彩,展现了特殊的屏障作用。依山傍水的环境,是早期人类定居的首选之地。先民们在碧村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黄河岸边的河前坡地上,从山坡到山腰,最后圈住整

遗址总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其中商周时期的遗存分布约200万平方米。通过对出土遗物的类型学比较,并结合碳14测年,可以建立从晚商至西周晚期的年代序列,为区域文化演进提供了重要标尺。

大型城址和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备受关注。考古学家在西头遗址西侧区域发现了一处面积约80万平方米的城址。通过对城址南城垣的剖析,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西周城址的发现,为区域聚落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考古学家在城址内发现了道路、城门、护城河等。在城址北侧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柱础下有石板,局部基址夯层厚达2米,说明其上有较大规模的建筑存在。在附近发现的灰坑、灰沟中,有2000余件筒瓦、板瓦残件,另有一定数量的原始瓷片、印纹硬陶片和打磨精细的蚌饰,足以说明该建筑等级之高。

城址内发现6处熔铜残炉以及熔铜块、铜渣、炉壁等遗物。科技分析显示,所见熔铜块应是对原有铜器进行二次重熔,因火候控制不当,产生了未完全熔化的现象,这为中国古代铜器的重熔生产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南城垣外侧发现深坑,坑内大型三足瓮内有炭化粟痕迹,坑底土质坚硬,近坑底有厚度2—4厘米的植物秸秆类堆积,其上部发现少许黄褐色植物种子,说明这个深坑应为储粮窖穴。这也从侧面证明这里人口数量之大。

上庙地点发现了大型围沟墓地,有墓葬近千座。2022年发掘甲字型大墓3座,其中一座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殉人最多的西周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海贝、蚌器、骨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如此多的殉人表明,这是一座延续商文化风格的墓葬。上庙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已发掘墓葬存在墓向相异、等级明显、随葬兵器比例高等特点。墓葬出土陶器有本地晚商时期延续下来的陶器风格,有来自周原或丰镐地区的典型周文化陶器,亦有来自泾河上游地区的红陶袋足鬲等器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苏秉琦、石

璋如等就在关中、泾渭流域寻找周人故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项考古调查与发掘在泾河流域陆续开展,揭示了区域内先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进入21世纪,西北大学古鹵地考古队在泾河中游及其支流三河水、洽峪河、泔河等流域进行长期调查,对区域内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分布规律有了全面的掌握。他们判断,泾河中游的支流三河水两岸台塬,是探索先周时期遗存的关键区域。与此同时,泾河流域还发现了多处重要的西周时期遗存。先周时期遗存分布数量多,“小群居、大聚居”,尚未形成等级差异;西周墓地则具有等级高、年代集中、商文化因素浓厚、随葬兵器多等特征。陕西泾阳高家堡墓地出土“戈”字族徽,被认为是周初迁来的“戈国”人群;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葬发现“泾伯”铭文,被学者认为是居于黑河流域的族群。这些墓葬处于关键的交通要道,为探讨周初人群迁徙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汉唐文献多有关于“鹵”地的记载,如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鹵城”位于三水县城以西30里的大塬上。以往学者多认为该文献为后世附会而成,但结合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位于三水河北岸的张洪塬,塬面宽大,商周时期遗址分布密集,是利用“排除法”寻找鹵地的好区域。

有学术目标,有文献研究,有区域调查,在旬邑西头遗址取得考古突破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目前,西北大学在旬邑建立了考古实习基地,这里将成为集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实习教育于一体的开放性共享平台。西头遗址的多学科合作攻关正在开展,古DNA分析将为人群迁徙提供直接证据,同位素分析将为人群来源、食谱结构提供支撑,植硅体分析将为环境变迁提供详细信息等。西头遗址的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诸多谜团还需要扎实的考古工作逐步解开,鹵地具体位置的进一步明确也有待未来更多考古发现来“指向”。

黄土高原腹地的泾河流域是奠定周代礼制文明的关键地域,我们期待文明探源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本版图片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版式设计:张芳曼



河南浞县仰韶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环。